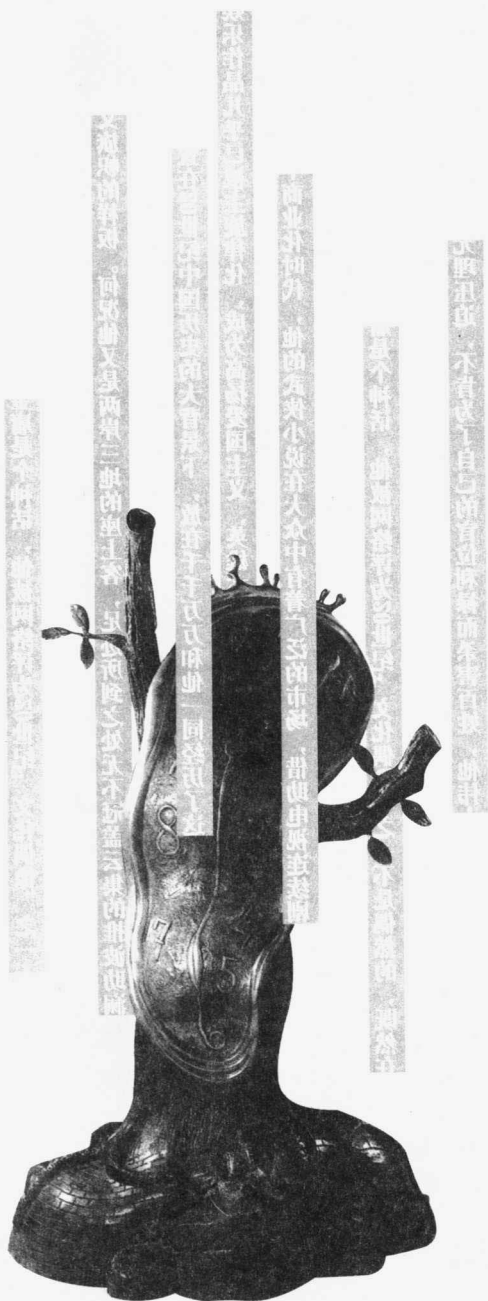


偶像的黄昏



傅国涌◎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偶像的黄昏/傅国涌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2

ISBN 7-5354-3238-7

I. 偶…

II. 傅…

III. 知识分子—研究—中国—现代—文集

IV. D663.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08100 号

责任编辑:康志刚

责任校对:陈 琪

封面设计:贺 凯

责任印制:吴竹敏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07 传真:87679300 邮编:430070)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9-10 层)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http://www.cjlap.com>

E-mail: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640×960 毫米 1/16 印张:15.875 插页:1

版次:2006 年 2 月第 1 版 200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82 千字 印数:1-10000 册

定价:18.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7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偶像的黄昏：从金庸到“金庸酒”	{ 1-27 }	1.
——兼谈金庸与中国知识分子现代人格的难产		
另一个李敖	{ 28-36 }	
张元济：力倡“中华民族的人格”	{ 37-44 }	
“羊性”、“狼性”与心中的“鬼子”	{ 45-53 }	
——我看《鬼子来了》		
打翻的五味瓶	{ 54-62 }	
——中国人走近诺贝尔文学奖的历程		
向继东和《湘声报》“文化·沧桑”副刊	{ 63-74 }	
——兼说影响过中国历史的副刊		
亵渎神圣	{ 75-83 }	
——对两次王朔现象的一点思考		
“那是揭开就会流血的伤疤”	{ 84-87 }	
吕荧是一面镜子	{ 88-89 }	
文化的底气	{ 90-93 }	
毋忘史家的传统	{ 94-98 }	
一个中断的学统	{ 99-103 }	
过去的中学	{ 104-108 }	
原谅与忏悔	{ 109-112 }	
“死别幽梦已茫茫”	{ 113-115 }	
有多少书可以重读？	{ 116-118 }	
出版界需要道德承担吗？	{ 119-124 }	
卖书岂能不知书？	{ 125-129 }	
学术论文“新八股”	{ 130-131 }	
爱因斯坦怎样走近中国？	{ 132-137 }	

目 录

- 诗人流年不似水 1138-1391
- 那盏灯熄了 1140-1461
- 何兆武的《文化漫谈》 1147-1491
- 废除科举制百年祭 1150-1581
- 苏珊·桑塔格的意义 1159-1611
- “不能不喜爱‘傻瓜’和‘学生腔’” 1162-1651
-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1166-1681
- 读《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
- 贫富之间的个人所得税 1169-1731
- 和余世存关于《非常道》的对话 1174-1791
- 比二〇六个县无律师更重要的 1180-1821
- 重要的是培育社会理性 1183-1891
- 与崔卫平对话
- 大学生“陪读”现象的忧思 1190-1921
- 大学生平均年消费超万元背后 1193-1951
- 丘成桐呼唤大学生做学问的热情 1196-1981
- “高校改名热”的误区 1199-2011
- 研究生失业不是偶然的 1202-2041
- “有知识、没文化”现象之忧 1205-2071
- 高校学费岂能不顾国情 1208-2101
- 公众为什么厚“丘”薄“杨”？ 1211-2131
- “象牙塔”为何沦为“重灾区”？ 1214-2161
- 从诺丁汉大学校长杨福家的感慨说起
- “艺考热”背后的“明星梦” 1217-2191

呼唤人的教育	【220-225】
——读《沙坪岁月——重庆南开校园回忆录》	
高考：莫把手段当目的	【226-228】
“救救孩子”：教育不公成为众矢之的	【229-232】
是谁夺走了孩子天真的童言？	【233-235】
金钱可以买来道德吗？	【236-238】
“创建文明城市”能靠背诵吗？	【239-240】
两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迷信	【241-243】
“县一中模式”还要行多远？	【244-246】
语文不是脑筋急转弯	【247-249】

偶像的黄昏：从金庸到“金庸酒”

——兼谈金庸与中国知识分子现代人格的难产

金庸是个神话，他被网络评为20世纪“文化偶像”之一不是偶然的，既然在一个商业化时代，他的武侠小说在大众中有着广泛的市场，借助电视连续剧的推波助澜，他的娱乐作品几乎已被主旋律化，成为高扬爱国主义、英雄主义旗帜的样板。何况他又是两岸三地的座上客，足迹所到之处无不冠盖云集，风光无比。这样的金庸不被神化才是一件怪事。分享金庸大餐正成为世俗化中国的一道风景，从形形色色的金庸文化产品到尚未面世的“金庸酒”，金庸产业化的进程正在加快。

将金庸放置在20世纪中国历史的大背景下，放在千千万万和他一同经历了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中间，我不禁为他最后的选择感叹。1948年3月，他年轻时就去了香港，没有遇到“思想改造”、“反右”、“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灾难，他凭着在殖民地香港赋予他的自由，创办《明报》、撰写武侠小说并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以一介文人名列亿万富豪榜之上。他在世界各地拥有数以亿计的读者，有着大量唯他马首是瞻的“金迷”。他本人生活在香港这个“世界的自由港”，到过世界上许多地方，对西方文明并不陌生。按常理推断，他完全有条件成就一个知识分子的现代人格，真正成为一个傲然独立的“侠之大者”，可是他最终陷于世俗的泥潭不能自拔，羡慕无聊的虚荣，喜欢肉麻的奉承，不

敢直面现实，在世界大势的认识上显示出浅陋无知的一面，在高唱民本主义高调的同时，无视人间真实的苦难，逐渐远离了这块大地。他自称是虔诚的佛教徒，对滚滚红尘中的虚名实利却那么在乎。这一切都暴露了他精神世界的苍白，与他享有的尊荣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他以80高龄，仍风尘仆仆、奔走南北，接受各地“金迷”的顶礼膜拜，不久前，他又赶了一场“华山论剑”，当他在华山顶上面对多少翘首仰望的“金迷”说出这句话：“我不是大侠，大侠是要舍得用生命去捍卫一些东西的，我做不到！”不知把他当作大侠的“金迷”们会不会大失所望。

和这个时代的许多名声显赫的知识分子一样，金庸的晚年只能让我们感叹，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要成就现代人格是何其艰难。什么是现代人格，或者说一个现代型的知识分子应该具备那些条件？起码应该包括这样几点：

一、不媚权、不媚俗，摆脱外在力量的束缚，做一个独立、自由的个人；

二、有社会责任感，对历史、社会、人生负责，有直面现实的勇气，是者是之，非者非之，有所为，有所不为，不苟且，不虚饰；

三、有专业知识或者专门技艺所依托的独特创造能力，能在某个阶段为某个领域作出新的规范；

四、始终不渝地追求真理，说真话，不说假话是最低要求。

以上所说，只不过一个大概，以此为尺度衡量金庸晚年的作为，我以为他是不及格的。

一、金庸的家世和道路

金庸原名查良镛，1923年生于浙江海宁袁花镇，这是一个典型的文宦之家，康熙称之为“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从元朝末年他的先祖从安徽迁居海宁，耕读传家直到他的爷爷这

一辈，500多年当中，海宁查家科甲鼎盛。迁居海宁的二世祖查恕即是一代名医，被征召入太医院，受明太祖朱元璋赏识，赐一品服。整个明代，查家共有6人中进士，17人中举人，其中有两人是杭州的亚魁。整个清代，查家中进士14人、举人59人，加上其他途径进入仕途的有数百人之多。特别是康熙年间，查家有10人中进士，三人在翰林院任职，当时就有“一朝十进士”、“兄弟三翰林”等说法。以书法、人品重于一时的查升在南书房38年，深得康熙器重。那时，查家可谓备极恩宠，达到了科举时代的巅峰。雍正年间一场突如其来的文字狱使查家受到重创。在此之前，清初顺治年间，因受湖州《明史》案的牵连，有才华的画家、学者查继佐曾遭下狱，但没多久即无罪获释，没有对整个家族造成大的冲击。这次文字狱后来被金庸详细地写进了他的小说《鹿鼎记》中。雍正年间发生的江西科场案是当时最大的一场文字狱，不仅当事人——位居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的查嗣庭——全家被下狱，他的长子被杀，本人在狱中服毒自杀，尸体被下诏示众，家属被流放，而且查家兄弟查慎行（嗣璉）、查嗣璫、查瑾等三家老少数百口都遭株连下狱，查嗣璫和家人被流放陕西，最后客死他乡。查慎行虽释放回了家，不久也死了。文字狱甚至牵连到所有浙江人，停止浙江乡试、会试各一科。经这次打击，查家一度中落，乾隆19年以后才有人中进士，康熙年间的辉煌已成前尘往事。金庸的爷爷查文清是查家最后一个进士，是他最敬佩的人，也是对他年轻时影响最深的人。查文清在江苏丹阳任知县时，因为发生著名的“丹阳教案”，被革职。邓之诚的《中华二千年史》曾引用了光绪《东华录》有关这一事件的记载，对此金庸引以为荣。他在小说《连城诀》的后记中说：“我祖父查文清公反对外国帝国主义者的无理压迫，不肯为了自己的官位利禄而杀害百姓，他伟大的人格令我们故乡、整个家族都引以为荣。”

500多年中，查家出了无数杰出的名臣、名医、学者、诗人、画家、书法篆刻家、文字学家、鉴赏家、史志家、水利家，他们

的事迹载入了《明史》、《清史稿》、各种地方志和古籍。即使到了近代以后，查家还出现了查人伟、查良钊、查良鉴、查济民等许多在各自领域有成就的人。

出生在这样一个名门望族，金庸为他的血统感到骄傲，他的《鹿鼎记》五十回的回目用的都是祖上查慎行的诗句。晚年与日本的池田大作对话时，他还津津乐道远祖查道“瓜田李下”的故事：

“中国的故事中也有‘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说的也是这种清廉之风。

“我们姓查的祖先之中，有一位叫做查道，宋朝人。他为人廉洁，有个故事常在儿童书中叙述。有一次他行路在外，途中又饥又渴，在路旁一枣树上采了些枣子吃了。为了偿还枣树的主人，他在枣树上挂一串钱，表示没有偷别人的枣子。”

尽管生在一个世代书香门第，少年金庸却是在抗战的烽火中成长起来的，经历了大时代的苦难，他的母亲不幸死在抗战之初逃难的动荡中。正在中学求学的金庸失去了家庭的呵护与接济，成为冬天没有袜子穿草鞋的沦陷区学生，海宁老家的房子被日本人烧成了白地。可以说，到他这一代，查家昔日的荣耀与显赫都已成为悠久的旧梦，但他从小生活在这样一个大家族中，耳濡目染，对自己的家世无疑有一种特殊的感慨。晚年他还清楚地记得家里挂的牌匾，那是康熙所赐，金龙装饰，帝王御笔，在没有经历过彻底的近代民主启蒙洗礼的中国，还有什么比这些东西更能打动一个少年的心呢。直到青年时代，金庸的志向都是做一个外交官。除了周游世界的诱惑，对当官的向往、对仕途荣华的倾心或许早已植根在他生命的深处。英年自杀的文学评论家胡河清在比较曹雪芹和金庸时说：“金庸出身在一个破落的旧贵族家庭。他们具有深远的家世感，从而从遗传密码和贵族生活方式中摄取了大量关于中国士大夫文化的隐蔽信息。同时‘破落’又使他们降入中国老百姓的生活之中，领略到了民间情感生活的深广

天地。”

金庸身上的文化基因对他人格、思想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目睹家族的衰微，时代的变迁，他有哀伤、有感叹、有失落，但他终于没有割断这根脐带。他对世俗价值的在乎，他追求的人生境界，都未能摆脱海宁查家挥之不去的影子。在他香港的客厅中始终挂着他的祖先查升手书的对联：“竹里坐消无事福，花间补读未完书。”其中透露出的是旧式文人的心境、意态。

回首自己的一生，金庸清楚地知道，没有香港，就没有金庸。无论是他的武侠小说还是他创办的《明报》，都是香港殖民地时代的典型产物，是香港造就了他。如果不是偶然的机会有来到香港，他留在大陆，以他的家庭出身，以他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学习的经历，以他曾在国民党背景的《东南日报》和“小骂大帮忙”的《大公报》的工作经历，就算逃过了1957年，也绝对无可逃于1966年。和千千万万知识分子一样，他生命中最美好的年华注定了将在漫长的流放、苦役和批斗中度过。他曾说过：

“如果我不来（香港），情况可能就完全不同了，我会继续留在上海，在上海《大公报》干下去，但可能在‘反右’的时候就给斗掉了，（笑）最有可能就是在‘反右’时给斗掉了，到后来在‘文革’时可能又糟糕了。”

在动荡的乱世中，金庸的求学生涯并不顺利，在浙江省立联合高中，他因言闯祸，以一篇发表在壁报上的《阿丽丝漫游记》得罪了炙手可热的训导主任，被迫离开学校。转学到了衢州中学，他又因卷入反对训导主任的学潮上了“黑名单”，差点被开除。在重庆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他再一次因冲撞校方，只读了一年多就失学了。他的青春时代向来不是一个唯唯诺诺的人，而且不时露出锋芒，不见容于权威。但他从来不是一个左派，从来没有想过要反抗这个现存的不合理的社会。他向往自由，好学上进，对未来有幻想、有憧憬。1947年10月，他考入上海《大公报》是他人生中重要的一步。这时离《大公报》“文人论政”理

想的陨落虽然已经不远，但他毕竟赶上了末班车，有幸亲聆胡政之他们的教诲，近距离领略文人办报、文章报国的风采。在香港《大公报》转型之后，他在那里继续工作了近十年，从翻译电讯到编辑副刊，从《大公报》到《新晚报》，从影评到武侠小说，最终他还是脱离了《大公报》，这一出走类似于他早年在学生时代的几次波折。他自称与左派思想有无法逾越的鸿沟，这是事实，在同样是左派机构的长城电影公司他也很快感到不适应。最终他走向独立创业的道路，自办《明报》，历经艰辛在香港林林总总的报纸中脱颖而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作为办报的“副产品”，他的武侠小说也陶醉了、娱乐了成千上万的读者。

度过上个世纪60年代初的困境之后，他的壮丽人生一幕幕在香港这个弹丸之地展开，他与《大公报》笔战，他的笔挺立在“文革”变幻的风云中。他在香港“六七”风暴中成了暗杀对象，他执笔的社评引起了世人的瞩目。他的《明报》王国屹立在这个世界的自由港。这样一个报人，一个对世局人生有深切了解，对中国历史现实都有着精到观察的知识分子，假如能始终如一地坚守他的独立品格，坚持他当年的新闻理想，他未尝不能成就其现代人格，以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而不是武侠小说家载入史册。然而，他没有做到，当历史出现了某些变化之后，他的许多选择只能让人失望。在忧患中，他保持了清醒，并有所承担，在安乐、在无边的鲜花和掌声中他不能自持。他的权力观、新闻观、金钱观、宗教观以及他强烈的反美、仇美观点，都暴露出他性格中懦弱、自私、贪婪、虚伪、狭隘的一面。一句话，在人格、思想、心理结构上他还没有走出古代。

二、金庸的思想世界

1. 金庸的权力观

金庸曾在《三十三剑客图》中说过：“研究中国历史上这些

大人物的心理和个性，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事。千百年来物质生活虽然改变极大，但人的心理、对权力之争夺和保持的种种方法，还是极少有甚么改变。”

他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对权力进行了无情的否定，正是为了至高无上的权力，乾隆背叛了六和塔上的盟约，践踏了海宁潮前兄弟击掌、互不伤害的誓言。美丽的香香公主最后留下血写的遗言“不要相信皇帝”，撕破了乾隆道貌岸然的面具，用鲜血刻出了他的阴险、毒辣和狡诈。《碧血剑》对李自成杀进北京以后迅速腐化、堕落的描述，也见证了“权力趋向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腐败”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倚天屠龙记》里的张无忌不具备做“政治领袖”的条件，却是个可以信赖的人，他有许多美好的品质。在人性的尺度之下，小说中的朱元璋和张无忌相比显得暗淡无光，美丽的周芷若也一点都不可爱。从《天龙八部》到《笑傲江湖》，金庸小说中常常出现“千秋万载，一统江湖”的口号，不过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另一种说法而已。从宫廷到江湖，都是如此。东方不败因掌握大权而腐化，任我行也免不了同样的结局，那是人性中的普遍现象。岳不群、左冷禅掌了权也一样如此。他们都野心勃勃，将无限的权力视为人生的最高目标，这是被数千年专制政治毒化的中国出现的畸形现象。与金庸写作武侠小说几乎同步，自1959年创立《明报》以来，他执笔写社评，特别是他的早期社评也贯穿着他对权力的批判、否定。他在《笑傲江湖》后记中得出了“政治上大多数时候是坏人当权”的结论。

如果不是《鹿鼎记》的出现，金庸在他的武侠小说世界对权力的否定几乎达到了现代认识水准，不幸他还是以最后的《鹿鼎记》完成了对权力的肯定。正如吴霁仪已深刻地指出的，《鹿鼎记》的真正主角不是韦小宝，而是康熙这个雄才伟略的英明君主典型。什么样的英雄豪杰、“侠之大者”，都比不上一个开明的当权者，世间的一切最终都得靠一个康熙这样的英明君主。

既然“侠以武犯禁”，与依靠好皇上实现一切人生社会理想的白日梦不和谐。到这一步，金庸的武侠小说确实写下去了。在这个意义上，二月河大肆吹捧康熙、雍正、乾隆之类创造“盛世”的好皇上不过是延续了金庸的这一思路罢了。

1994年，金庸访问台湾时亲口说：“在中国皇帝中，我对康熙的评价很高，他不但思想开明，而且很好学，还去学了外国的学问。”从否定权力到回归权力，金庸的权力观的演变表明他最终未能走出传统士大夫式观念。对皇权的依附和对好皇帝的期盼曾是中国读书人几千年的梦。

因为办报成功，从麦理浩到尤德、卫奕信，金庸成为历任港督的座上客，他们几乎每天都要读他的社评。20世纪70至80年代，他曾担任香港廉政专员公署市民咨询委员召集人和香港法律改革委员会委员。1985年，他应大陆政府邀请，担任香港基本法草委近五年。在香港回归问题上，他坚决地站在大陆一边，与北京的立场不谋而合，遭到香港社会、舆论的攻击，游行示威、焚烧《明报》，他都不为所动。1992年笔伐彭定康之后，1995年，他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委员，一度还有人说他想做香港行政长官（他对此坚决否认）。

有一种看法认为，金庸晚年日趋保守，在功成名就之后，安享富贵，失去了六七十年代批判的锋芒。其实，金庸是个极为复杂的人物。他曾说过：“我的立场，就像一双笔直的筷子，从来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桌子上摆放食物的圆盘。”1981年7月，他应邀访问大陆，受到邓小平的亲自接见以及国宾待遇。事后他在香港发表的文章，对大陆政权“有一种绝非客套而是由衷的认同与回归感”，他对邓的“仰慕”也出于真心而不是客套。即使在“文革”时期，他在《明报》社评猛烈抨击林彪、江青的同时，也一再表示对周恩来、邓小平他们发自内心的崇敬，他曾多次在社评中为邓小平等仗义执言。这一点往往被人忽视了。他身居英国治下的香港，精通外语，阅读过大量的外文书，有机会接

触先进文明，但他还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人，他潜心古代题材的武侠小说创作近二十年，他对《明报》的治理有浓厚的人治色彩，没有多少现代企业精神可言。有多位熟悉他的人（如黄霑、林燕妮等）都说到他的“独裁”、“不民主”。作为一个非常传统的中国人，他有着强烈的忠奸观念，他身上有着类似古代士大夫那样根深蒂固的“忠君情怀”。他对康熙的崇拜完全是由衷的，发自内心的。

2. 金庸的新闻观

从1946年11月在杭州开始报业生涯，到1993年出售《明报》，金庸的大半生都没有离开新闻界，《明报》成全了他，使他成为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报人，在两岸三地尤其有相当大的影响。尽管他的武侠小说是蒋经国和邓小平的共同读物，但他同时被两岸政治领袖所器重，相信主要不是因为武侠小说，而是《明报》。他最信奉一句格言：“事实是神圣的，评论是自由的。”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他办的《明报》恪守了客观、独立和公正的原则，也就是追求新闻自由的理想。

早在1960年5月20日，他就在《本报创刊周年感言》社评中说“……在政治上我们力求中立，决不对左派或右派作任何不公平的偏袒。……本报自始至终要信守‘明辨是非’之信条……本报不接受任何方面的经济支援”。1969年5月20日，他发表《创刊十年，亦喜亦忧》社评，再次表示“我们相信读者，所喜欢《明报》‘客观报道，客观评论’的作风，赞同我们‘明辨是非’的办报方针”。先后当过《明报月刊》和《明报》总编辑十几年的董桥也回忆说：

“当年，查先生给我的聘书上提醒我必须‘遵照《明报》一贯中立、客观、尊重事实、公正评论之方针执行编辑工作。在政治上不偏不倚，在文化上爱护中华民族之传统，在学术上维持容纳各家学说之宽容精神’。”

毋庸置疑，金庸早期的新闻观受到了新记《大公报》“四



不”方针的影响，直到晚年他还说过：“我投身《大公报》，心里很佩服《大公报》当时的不党不卖，评论事件很公正，完全报道。”他认同胡政之时代《大公报》的理想、立场，也就是在大时代风云的变幻中不偏不倚、保持中立，该赞成的就赞成，该反对的就反对。

情况从80年代开始发生了一些微妙

变化，在有关香港前途问题的争论中，金庸充分利用《明报》这个载体表达他自己的意见，受到广泛的批评，大学生甚至在《明报》大厦前当众烧毁《明报》以示抗议。作为报纸老板，金庸不得不面对报纸到底是社会公器还是老板私器的质疑。对此，他本人在多年以后公开提出“报纸是老板的私器”，“新闻自由其实是新闻事业老板所享受的自由，一般新闻工作者非听命于老板不可”。“新闻自由，是报社员工向外争取的，而不是向报社内争取的。报社内只有雇主与雇员的关系，并没有谁向谁争取自由的关系”。他坦率直言：“我在主持《明报》时，关于香港回归后行政长官直接选举还是间接选举的问题，和主持编务的编辑主任看法不同，他消极抵制，我并没有即刻将他解雇，仍保留他

的职位，但不让他处理实际工作了，换一个听话的人来做。”

这是他在1999年10月杭州一个全国性的“新闻业机制改革与经营管理”研讨会上的发言，以《两种社会中的新闻工作》为题刊登在当年12月上海的《新闻记者》杂志。除了提出媒体私器论，他在这次讲话中表达了“对新闻传媒作为政党‘喉舌’与‘工具’的理解”，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传播媒介“全然谈不上什么‘真实报道，公正评论’”。“并用大量事实痛斥了西方所鼓吹的‘新闻自由’、‘人权大于主权’的极端荒谬性”，他说：

“……解放军负责保卫国家人民，我们新闻工作者的首要任务，同解放军一样，也是听党与政府的指挥，团结全国人民，负责保卫国家人民。”

此论一出，在香港和海外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连他多年的老友、同事、温文尔雅的董桥都坐不住了，当年12月也就是读到《新闻记者》杂志上刊登的发言记录之后，董桥写下了《金庸在杭州的谈话》一文，表示自己有“天涯咫尺”之感的惊讶。

事隔很久，人们都忘不了金庸有关新闻的这些观点，2001年他到台湾访问，记者仍在追问这事，他说：“台湾媒体也应该跟台湾国军学习，这是一致的。”有人以为他言不由衷，未必是他真正的想法。其实，这是他深思熟虑之后的观点，2000年9月，他在湖南岳麓书院回答记者提问时也说过：“浙江大学新闻系的同学问我办报怎么办。中国内地办报是为人民服务，所以说办报要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人民服务。”

从信奉“独立、公正、客观”到媒体私器论，再到他提出媒体“同解放军一样”，如同他从否定权力最终完成了对权力的归依，金庸新闻观的转变同样透露出他内心世界的许多秘密。

3. 金庸的美国观

1999年10月，金庸在杭州作《两种社会中的新闻工作》讲话，明白地把他的美国观袒露在世人面前：